

专家视点

研究与对策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守护共同精神家园

以税收杠杆作用 促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 马衍伟

□ 李心峰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并于2008年元旦起开始施行。此次国家法定假日调整,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几个重要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对传承和弘扬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次调整以来,传统节日的存续与发展、传承与弘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呈现出新的情况与态势,产生新的经验与问题,需要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弘扬传统节日,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民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源流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唤起国人参与节庆活动的热情,并形成守护共同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厚重多彩,主要体现在:1.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2.中国传统

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3.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的写照,蕴含着中华传统美德。4.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凝结,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探讨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

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既要重视对其各种传统符号与仪式的正确认知与传承,也要提倡各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代转换与新的创造,以适应时代需要。应充分认识中国各个重要传统节日都有其丰富复杂的文化元素和象征符号体系,也有其复杂的礼仪与仪式,决不是简单化地用某一种象征符号所能充分代表。但这并不妨碍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有关节日代表性符号、仪式的标识设计大赛、评选、发布之类的节日文化活动,来营造节日气氛,丰富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这种节日符号、仪式的标识,可以不限于一种、两种,而是可以由多种或多组组合构成。关于节日的载体与形式,今天我们应密切关注在新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传统节日新载体、新形式。这些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既不失传统节日精神文化的文脉,又植根于当代人的现代生活土壤,与现代人的传播媒介相结合,与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相协调,它的产生并不为人们所接受,有其必然性,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积极引导。

关注培育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自觉

青少年是传统节日的重要传承群体之一,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将直接影响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前景。调查发现:我国节日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情况从总体上看呈现出良好态势,我国青少年对传统节日包括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较高的认知

水平。虽然西方节日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认知、认同和参与程度,但未与传统节日文化产生明显冲突。我国青少年倾向于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并重,但在价值和情感上,还是略倾向于中国传统节日。我国青少年对节日内容加以丰富和充实的要求远大于创造所谓的“新节日”。青少年对政府弘扬节日文化、重视节日文化内涵的重建或创新,普遍持支持、理解和乐观态度。但学校和教师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这个载体进行主题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尤其是文化和教育部门要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增强他们对传统节日的认知、体验和理解,培育他们的文化自觉。对于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教育,首先应注重体验性与参与性,力避灌输式的空洞、被动的知识灌输;其次,应提倡学校教育与家长教育相结合,创建家庭与学校双轮驱动的传统节日教育体制,努力建立和完善传统节日教育与科研体系,构建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完整传统节日教育体系,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教学阶段教学需求的传统节日教材,努力形成包括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内的传统节日科研体制,把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代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正确对待“洋节”,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

在近年来有关传统节日的讨论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是“洋节”对于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客观评价外国传统节日。调研显示:前几年媒介报道和社会舆论夸大了人们对“洋节”的期待,人们对“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差异不大。当下人们关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冲突的看法日趋理性,人们更多是借助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参与“洋节”。研究发现,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重视弘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而且注重传统节日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通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创造了可观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欢乐体验;民族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节庆活动创新、品牌意识明确;政府转变职能、民办节日为主;市场运作模式、广泛筹集资金。

加强中国传统节日的海外传播

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为此,我们选择在海外影响最为广泛的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典型和代表进行了初步调研。调研表明,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传播,应该突出自我文化特色,挖掘其丰厚文化内涵,探索其独有的文化传播道路。就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应根据这些传统节日在各国影响深浅上的不同以及不同国家对春节等节日的认知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宣传形式和传播方法。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充分借助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人优势,秉持我们民族“天人合一”、“和合为贵”的价值追求,让中国的传统节日真正走向世界,真正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正确对待“洋节”,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

在近年来有关传统节日的讨论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是“洋节”对于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客观评价外国传统节日。调研显示:前几年媒介报道和社会舆论夸大了人们对“洋节”的期待,人们对“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差异不大。当下人们关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冲突的看法日趋理性,人们更多是借助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参与“洋节”。研究发现,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重视弘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而且注重传统节日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通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创造了可观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欢乐体验;民族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节庆活动创新、品牌意识明确;政府转变职能、民办节日为主;市场运作模式、广泛筹集资金。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人们通过购买健康保险转移医疗支出意识日益强烈,预计2015年全国商业健康保费收入将达4500亿元左右。面对健康保险商业服务税收扶持政策供给不足的现状,我们应着眼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拉动健康保险需求,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框架内,围绕试点改革、差别税制、优化税基等内容,建立健全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

一、运用税收杠杆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基本思路

目前我国实行的以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印花税等税种为辅的保险业税收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导向,但由于缺少专门性税收优惠政策,很难适应未来庞大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需要,因此有必要在保持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对相应税收政策的框架、类型、方式和力度进行适度调整。

首先,可考虑按照“细化税目、差别税率、优化税基、协调税种、公平税负、规范优惠”的原则,着眼发挥税收功能与保险功能良性互动的协同效应,建立健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激励机制。

其次,可考虑把保险业作为税制改革的创新行业和试点行业,着眼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功能,逐步建立符合国情实际、适应行业特点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支持体系。

第三,可考虑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国家税收政策体系覆盖到所有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业,营造有利于各类保险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实现健康保险与国内其他保险乃至其他金融服务之间的税负公平,促进健康保险市场的差异化竞争,使健康保险在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服务中形成比较优势。

二、调整税收政策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具体建议

1、在商业健康保险行业率先进行相关税收改革试点,探索建立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税收制度。一是可将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之内,释放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业发展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可将商业健康保险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内,缓解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给保险业带来的重复征税负担,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活力。

2、比照发展物流业的税收措施,研究出台健康保险服务业的税收政策。一是在支持保险公司从事商业健康保险方面,重点围绕鼓励发展健康专业保险、规范发展相互保险组织和鼓励试点设立自保公司、鼓励专业保险公司运用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和设立医疗机构等方面出台一些引导性政策。二是在扶持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方面,重点围绕推动保险资金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开发各类补充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产品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在促进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健康保障服务方面,重点围绕鼓励具备条件的专业保险公司“走出去”、支持国有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上市、满足专业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创新业务和另类投资需要以及优化保险企业薪酬体制等方面出台相关税收政策。

3、根据不同险种细化税目设置,实行保险服务业差别税制。对政策性强、非营利性险种应减免税;对利润水平低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险种应规定较低税率;对赔付率低但利润较高的险种应适用较高税率;对商业健康保险中限制植人险种应采用较高税率;对市场需求大但国内承保能力不足险种应适当降低税率。

4、优化商业健康保险的税基,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措施。一是优化营业税税基。可考虑在现有免税规定之外,以保险机构取得的全部保费收入扣除已决定赔款部分作为营业税应税保费,当发生储金返还和退费时,则由保险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扣缴有关税款。二是优化企业所得税税基。提高呆账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简化纳税调整方法。允许应纳税年度的合同项下的赔款支出,尤其应对保险保障基金、健康保险准备金的提取进行严格规定。对大病医疗统筹的保费以及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保费,允许企业作为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以刺激企业的保险需求。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基。完善个人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支付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居民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支出从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政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营销员的展业成本及其佣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研究”负责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成果选登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 李维武

由孔子所开启的儒学之所以能够由古及今不至衰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学内在的因素,也有时代提供的条件,还有儒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及其合力。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百年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意义,而且是理解儒学在今天与未来走向的一大关键。

却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认为儒学在20世纪的新开展,并不在于反对从西方引入“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实践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撑。因此,现代新儒学在认同“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主张“民主”的同时,更强调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儒学成功地经历了由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转换,继续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孔子所开启的儒学由古及今不衰衰绝

资料图片

从经学时代到后经学时代

自汉代起,经学成为儒学开展的基本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学内部即已萌生以新代旧的更化,在龚自珍、魏源那里以复兴今文经学的形式显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学中的新因素与旧传统仍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学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表达变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态,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经学又继续起着维系中国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张之洞等人坚持在大学堂设置经学科,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主张尊孔读经。

从精英之学到大众之热

现代新儒学与近代经学的区别,在于从形态上由解读儒家经典而转向自创哲学体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而转向专注学术研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除少数为史学家外,大多是哲学家。他们围绕文化观和历史观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人生观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开创了文化儒学,发展了形上学,探讨了人生儒学,使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作出了重要建树。

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家们贡献尤大。20世纪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本体论体系先后建立。这些体系固然分别继承了宋明道学中心学与理学两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会了西方哲学资源,以回答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哲学与科学、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直觉、理想性与主体性等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至20世纪下半叶,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和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相继创立,进一步推进了形上学本体论建构。

现代新儒学的形上学追求,虽然在哲学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学成了一种书斋里的精英之学,因而引发了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徐复观就曾主张“消解形而上学”,对熊十力诸师友的本体论建构提出批评,希望把

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这种主张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这种状况直到最近20年才出现了根本性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思想空间的不断开放,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渐由精英之学演变成大众之热。一批儒学学者,通过创办文化书院、主持电视讲座、运用网络传播、倡导儿童读经等多种方式,使儒学再次由书斋走向大众。儒学的这一新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人重建价值观的需要——人们希望能在儒学中获得建构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对传统儒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早在康有为、章太炎那里即已自觉开启。他们所复活的传统儒学的“大同”、“小康”、“革命”诸观念,对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一工作不仅为现代新儒学所继续,而且为许多现代新儒学以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开展。这些现代新儒学以外的人们,未必会认同复兴儒学,但却会重视对传统儒学思想资源

进行现代转化并加以吸取与承继。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如毛泽东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论、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牟宗三的中国儒学返本开新论、傅伟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论。也正是这样,出现了传统儒学资源所进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化工作。儒学在后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过这种转化显示出来。可以说,这种对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了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功能。

在儒学成为大众之热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建构自己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儒学存在着何种历史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儒学中吸取哪些思想资源?这些都是这一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又关系到儒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

观点荟萃

发展伦理学的范式转换

□ 陈忠

本项目阶段性成果、专著《发展伦理研究》对发展伦理学及发展伦理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对“什么是合理的发展伦理学、如何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反思。一是提出确立发展伦理学的规律范式、哲学范式,以揭示发展的历史规律、现代性的历史本质为基础,对发展伦理学进行更为深层、具体的把握,建构直面问题的深层发展伦理学并具有选择论意蕴的发展伦理学。二是对发展伦理学与文化人类学、新全球史、风险社会理论、空间生产理论等进行比较研究,对其中的发展伦理学意蕴进行挖掘。三是对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创新问题进行思考,提出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推动发展伦理学与发展理论创新、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的高度理解发展伦理学与发展理论创新等观点。四是对目前西方发展伦理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与超越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发展伦理与和谐世界：发展伦理学的范式转换与‘和谐世界’的历史构建”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

加快推动中国500强企业转型发展

□ 干春晖

以500强为代表的中国大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面对世界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国500强企业必须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转型发挥更大作用。一是要抓紧企业转型,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关注规模和效益的同时,必须更加关注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着眼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进行技术创新,用技术推动企业发展,实现自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变。三是加快体制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和壮大民营企业规模,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使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四是融入国际市场,加快500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主动加入全球产业链网络。五是缩小地域差异,打破地域疆界,促进500强企业的区域性协调发展。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